

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,参观者在幸存者人像墙前驻足观看 CFP供图

## 还原那个冬天的血色南京

一位被历史选择的作家

从1987年到现在,近30年过去了。这期间,徐志耕的报告文学《南京大屠杀》出版了21个版本,被翻译成了英语、法语、日语。徐志耕也从一个壮年记者,变成了一名退休作家。他当年采访过的90多位大屠杀幸存者,如今仅有夏淑琴一人还活着。

“上个世纪80年代,这个研究领域刚刚放开,大屠杀幸存者群体很多都健在。我前面的人没法写,我后面的人也没法写,很多人都去世了。”徐志耕说,“其实是历史选中了我。”

因为《南京大屠杀》的出版,徐志耕的人生被改变了,此后他又完成了许多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作品。读者寄给他的信有好几袋。通过这本书,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南京大屠杀,有的也加入到研究者或传播的队伍中来。“北京有青年成立了对日索赔委员会,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;台湾有位女作家写了《明妮·魏特琳传》。”徐志耕说。

徐志耕表示,将会参加即将到来的国家公祭日活动。徐志耕打算将当年的采访笔记结集出版。

“希望自己能再做点事,这不是为了记住仇恨,这是为了和平。”徐志耕说,“和平是一条理想的路,也是一条漫长的路。”

### 从发现新闻到发现历史

戴袁支年纪大了,还患有心脑血管疾病,但一激动,他还是会立即站起身。他用手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根立柱上比画着,“江南水泥石厂难民营里最多时超过20000人。”退休前,戴袁支是中青报江苏记者站的记者,2000年起,他开始从事长达十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调查研究工作;2011年退休至今,已完成“南京栖霞两座万人难民营课题”的他成为了一名呼吁文物保护的卫士。

今年4月,丹麦女王来到南京,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时,亲手种下辛德贝格黄玫瑰。黄玫瑰的名字,来自于辛德贝格,一个南京人不应该忘记的丹麦人。

2000年以前,中国史学界在拉贝日记中发现了辛德贝格的名字。



徐志耕

作家

活着的历史。徐志耕的回忆构成了他的报告文学《南京大屠杀》,是世界范围内这一段历史的缩影。



戴袁支

原中青报记者

德勒填补了历史的空白。他在发现新闻的同时也发现了历史,他挖掘出的《南京辛德贝格》,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。

“高兴祖老师想要寻找辛德贝格,那个时候,我是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新闻选题完成的。”戴袁支说,遗憾的是高兴祖于2001年去世了,他打算帮高兴祖实现这个遗憾,找到辛德贝格。“当时的背景是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,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,修改教科书,史学领域的新发现也是新闻,这样我便萌生挖掘下去的决心。”

当时唯一的线索是位于南京东郊的江南水泥石厂。有人告诉他,大屠杀期间,这里曾经升起过十字旗。“所谓的十字旗,其实就是丹麦国旗。”

在对附近村民的寻访中,戴袁支勾勒出当年的历史轮廓,1937年冬,南京城成为炼狱,城东郊的乡村也人心惶惶,大量的村民逃到江边,却无力过江,眼看敌人屠刀逼近,他们只好回头求生。江南水泥石厂的上空飘扬着一面德国国旗和一面丹麦国旗,这成了大家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在此后的调查中,德国人卡尔·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的身影越来越清晰。戴袁支发现,这两位“南京辛德勒”庇护了数万名中国人的性命。

尽管完成了“南京栖霞两座万人难民营”的课题研究,出版了《1937—1938:人道与暴行的见证》一书,并参与了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》的整理与编纂工作,但戴袁支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记者。实际上,他从调查、研究到传播,都是以记者的身份完成的。

“刚开始调查的时候,我找来一些大学生志愿者,当时史料很少,我们只好采取土调查的方式。”戴袁支说,他们沿着日军进军南京的线路,从句容到汤山,再到仙鹤门,去了每一个村庄,寻找了村里够年纪的老人,记录他们口述的历史。

就这样,在一篇篇新闻报道的间隙,戴袁支完成了他的转身,他发现了卡尔·京特和辛德贝格,也考察了江南水泥石厂和栖霞寺两座难民营,还获得了来自丹麦的认可。

如今,戴袁支依然在进行着自己的研究与寻找,更多时候,他又转身成为了一名抗战文物保护者。戴袁支说,如今,江南水泥石厂万人难民营遗址仍在,但年久失修,随时有毁灭的危险。“活着的证人越来越少了,不能再让这些证物也消失掉。”

## 他们照亮历史 唤醒尘封的“南京真相”

### 活在历史中的 高老师

当下的研究者在接受采访时,一提到高兴祖的名字,总会恭敬地加上“老师”两个字。

这位国内史学界公认的“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”早在2001年就已去世。不过,即便再过几十年,在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,高兴祖依然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。

早在1960年,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就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,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查研究,并于1962年完成了书稿《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》。但直到1979年,这本书稿才得以编印出版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,中国学术界开始大规模研究南京大屠杀。1982年,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,日本右翼分子不断美化侵略和否认南京大屠杀,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。

其时,早有研究的高兴祖成了这项研究的领军人物,直到今天,研究者们调查研究方式还与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殊无二致。

高兴祖寻找并走访了大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,见证者,实地走访并记录下当年日寇实施暴行的遗址,留下大量珍贵的图片史料,他还把研究扩展到大屠杀死难同胞研究、慰安妇研究、荣字1644细菌部队研究等领域。1937~1938年间《纽约日报》等西方报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,也都是由高兴祖最早翻译成中文的。

作为先行者,高兴祖的研究影响了无数人。而高兴祖在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的作用还不止于此——他还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坚定的拥护者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频繁见诸报端,几乎每一天,都会有幸存者被发现,但社会上存在这样的观点,“过分渲染这段历史,对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没有好处。”

高兴祖不这么认为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表示,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意义重大,一是有助于人们认识侵略战争的残酷性,从而推动人们维护和平。二是重温这段历史,有助于推动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,使中日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向前发展。三是有助于人民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。”

这样的历史观同样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。2001年,高兴祖去世。2005年8月15日,他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“特别贡献奖章”。

### 他和他的团队 让历史板上钉钉

张宪文的头发全白了,眼睛却炯炯有神。1934年出生的他是南京大屠杀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,早过退休年龄的他,带着100多位专家学者,完成了72卷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》。



高兴祖

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者



张宪文

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者



章开沅

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者

他查阅资料,意外地发现了他的老师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。

美国人贝德士曾在金陵大学任教,南京沦陷前后,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,也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重要骨干和最后一任主席。贝德士根据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,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记录。1945年,贝德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罪行。

这些资料内容丰富,里面有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。

其时,章开沅是国内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大家,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深,但这些资料吸引着他走下去。

1988年,他再次赴美参加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,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,唐德刚、邵子平等友人提出成立对日索赔会,并且当场召集发起人签名。当时大陆到会的学者就章开沅一人,因此便成为祖国大陆的当然代表。在章开沅提笔签名之际,一位旅美华裔女作家在一旁笑问:“你敢签名吗?”章开沅笑着回答:“死且不惧,何况签名。”这个对日索赔会,后来改名为“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”。

在贝德士文献的基础上,章开沅撰写了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》,编译了《南京:1937.11—1938.5》。这两本书出版后,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,但也引来日本右翼学者的攻击。

日本右翼学者认为,贝德士文献只是当时别人的记述,带有很大偏见。章开沅决定反击,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证据之路。

为此他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,将当时留在南京的9位传教士及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到南京的传教士共10人的原始资料编译成册,即《天理难容——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(1937—1938)》一书。这本书增加了许多资料,除了贝德士文献外,还有费莫生、福斯特、麦卡伦、马吉、米尔士、史迈士、华群、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资料。这些资料都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,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,其公正性、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认的。所以,此书的史料价值极高,与以往注重学理论辩的论著不同,章开沅在编著这些书时,尽量原文照录,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,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直接接触当时、当地、当事的第一手材料,便于读者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。正如他在书中引用贝德士的话所言:“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,那就让事实说话吧。”

为了寻找“事实”,章开沅的足迹遍及中国、北美和日本,这位曾经以研究辛亥革命史出名的研究者,又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。按照章开沅自己的说法,有一种力量,或者说有一种召唤,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开始大规模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。当时,距那场浩劫已经近50年,亲历者大多白发苍苍,实物资料散落于世界各地,教科书也鲜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。历史渐渐被人遗忘。

幸运的是,研究者们站了出来,他们采集大屠杀幸存者证言,四处寻访证物,不辞辛苦,用一片片历史的碎片,拼出了一段沉重但明晰的历史画面。

三十多年过去,中国人都知道了南京大屠杀,记住了“30万”这个数字。2014年12月13日,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公祭日。

最初的研究者们已经老了,有人甚至已经成为历史本身,但值得欣慰的是,他们当年撒下的种子,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王颖菲/文 施向辉/摄



道人心,研究者与传播者们的工作功莫大焉。南京大屠杀的历史,事关正义与邪恶,事关世